

# 日本對匪政策的檢討

朱少先

## 一 前言

日本是世界上對國際政治敏感度極高的國家之一，國際上稍有些風吹草動，日本便立刻有所反應。當一九六一年甘迺迪就任美國總統之後，一般日本人認爲美國新政府對外政策，尤其是對匪政策將有變化，因此竟有人建議應在美國允准共匪加入聯合國前，搶先承認共匪。今年三月三十一日詹森總統宣佈「部份停炸北越，縮小越戰範圍及放棄總統競選」後，在日本已掀起了高潮

，運輸大臣中曾根康弘在內閣會議中，竟公開表示，對美國此次突然改變對越南政策，事前既未曾知日本，焉知美匪不會隨時攜手。因此極力主張政府應立刻檢討對匪政策，並應擴大對匪貿易，准許由政府銀行資金，担保對匪輸出。在自由民主黨內部，以藤山愛一郎、赤城宗德、古井喜實等反佐藤派爲中心的「新政策懇談會」，除了主張積極推進日匪貿易外，批評政府「政

經分離」原則爲非現實性，認爲日本應成爲美國與共匪之間的橋樑，促成美匪接近。以松村謙三、宇都宮德馬等黨內親匪派所組成的「內外政局研究會」，除積極支持「日匪備忘錄貿易協定」外，更要求政府取銷「吉田書簡」，主張以政府銀行資金協助對匪作分期付款貿易。該兩個集團，並在四月六日舉行聯席會議，除佐藤、福田（福田赴美）主流派外，幾乎各派人士均有代表參加，包括三木派在內。在會中除了決定積極推進對匪貿易外，並主張與美國國會內議員（鴿派）密切聯繫，促進美匪關係。事實上藤山、赤城等與美國參院中的傅爾布萊特、曼斯菲爾德等早已有聯絡，這次集會，僅爲配合行動。

在野黨方面，日本社會黨於四月二日下午對民主黨、公明黨、日共發出一緊急邀請書，要求舉行野黨黨魁會談，商討聯合行動。除準備支持詹森總

統之越南新政策外，將追究佐藤首相越南政策之政治責任。欲以聯合行動，逼使佐藤內閣總辭。因民主社會黨一向反對與日本共產黨採取聯合行動，首先拒絕社會黨之邀請。雖然四野黨會談因民主黨不參加而未能召開，但四野黨追究佐藤內閣過去支持美國越南政策之政治責任及擴大對匪貿易之主張，則均一致。尤其是社會黨，甚至策動對匪復交運動。

最近一個多月以來，由於日匪雙方簽訂了「日匪備忘錄貿易協定」及詹森發表三月三十一日聲明後，無論在執政黨內部、在野黨及左翼團體，要求政府變更對匪政策，要求擴大對匪貿易，要求取銷「吉田書簡」，甚至要求與匪復交之聲浪，此起彼伏，甚囂塵上，使佐藤政府，相當困惑。

「對匪政策」問題，原已極爲複雜，在日本歷屆內閣中，也是執政者最難於解決的問題之一。並且成爲執政黨內部及政黨間的政爭工具。每次國際情勢稍有轉變或日本國內國會議員選舉時，往往有「制匪日問題制天下」之論。因爲日本以貿易立國，而對大陸貿易，爲一般短視商人夢寐以求之事，各政黨爲爭取選民，達成其政治目的，可不擇手段，以改變對匪政策及擴大對匪貿易爲號召來謀取支持，乃屬常事。

今年七月是日本參議院議員大選之期，十二月又逢自由民主黨總裁改選，自本年初起，各方面早已蠢蠢欲動，適於此時，日匪間所簽訂的「日匪備忘錄貿易協定」，由上次「日匪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的五年貿易協定（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縮短爲一年，雙方貿易總額又減少爲一億美元，此項協定期間之縮短與貿易額之減少，構成了各政黨及親匪商業機構指責政府對匪政策不當之藉口；繼之詹森總統突然變更越南政策，更造成了各方攻擊政府的好機會。而要求政府改變對匪政策，成了大選前的中心口號。佐藤政府在此內外強大壓力下，是否有改變對匪政策的可

能，頗值得重視。故檢討日本對匪政策，極為重要。

## 二 日本歷屆內閣之對匪政策

日本是實行政黨政治的國家，其政策之制訂，是基於黨的決定，戰後除了一九四七年片山哲係社會黨內閣外，其餘均由保守黨執政。日本恢復獨立後，吉田茂五次組閣，繼之鳩山一郎、石橋湛山（兩氏組閣期間均甚短暫，但較接近匪俄）岸信介、池田勇人及現任首相佐藤榮作，其內閣對外政策，均以對美外交為中心，採取親美、反共政策。因為此項政策，係由執政黨所決定，首相是政策執行人，容或在執行技術上有若干方式上的不同，但其基本方針，不可能任意加以改變。戰後自民黨歷屆內閣對匪政策的發展與演變，頗多曲折，分別加以闡述。

日本自一九五二年正式恢復獨立並獲准加入聯合國後，其對外政策，一直堅持：（一）以聯合國為中心；（二）與自由陣營國家協同合作；（三）把握亞洲一員的立場的所謂「外交三原則」。吉田茂、岸信介、池田勇人等自不待言，即使親匪俄的鳩山一郎與石橋湛山執政期間，亦無不以此三原則為推行外交政策的基礎。其基本政策反共並站在自由世界一邊，應毫無疑義。至於對共匪政策，歷屆內閣，一直採取與我國維持正常外交關係，對共匪採取不作任何政治承認之原則。在「政經分離」政策下，與共匪實施經濟、文化方面的接觸，其接觸程度的深淺，貿易額的多寡，則視當時的國際情勢、國內環境及首相個人觀點，容有若干不同，但其基本方針，從未改變。

在吉田茂執政期間（一九四八——一九五四年）曾於一九五二年及一九五三年與共匪簽訂了第一次及第二次「民間貿易協定」，雖然貿易額不大，但雙方正式開始了經濟貿易往返。鳩山一郎繼吉田茂組閣後（一九五四——一九五六年）對匪態度較為積極，一九五五年曾准許共匪派代表團訪日，並簽訂第三次「民間貿易協定」，因為當時政府對匪態度軟弱，加以一九五六年十月日俄雙方以發表「共同宣言」方式復交，使匪俄勢力，大量滲入日本，國內左翼勢力，亦隨之氣焰高漲，不斷壓迫鳩山內閣，承認共匪政權。但鳩山首相仍僅止於擴大對匪貿易與加強人事交流，始終不敢作承認共匪的承諾。石橋湛山在自民黨內親匪著稱，但因執政期間（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九日）甚短，任期內並無任何作為。至同年二月

二十五日岸信介內閣成立，對匪政策甚為堅定，在其執政後所宣佈的外交方針中，明白表示日本制訂亞洲政策時，尊重中華民國之意見，並表示不承認共匪政權；但在對匪貿易方面，仍無法對抗各方面壓力，於一九五八年二月簽訂「五年民間鋼鐵協定」（自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五年間貿易總額為二億英鎊），同年三月又簽訂了「第四次民間貿易協定」（為期一年，貿易總額為七千萬英鎊），而且在協定中規定雙方得在東京與北平設置民間貿易代表機構，並准以分期付款方式貿易等政治條款；當時岸信介政府雖未對上項決定提出保證，但我政府鑑於後果堪虞，除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外，一面宣佈斷絕對日一切商務關係。日本政府經內閣會議通過，正式致函日匪簽約雙方，表明日本政府態度，認為前項協定係民間協定，非政府間協定，故「中共」貿易代表未具有外交特權，並不允許懸掛「中共國旗」，共匪對此備忘錄，認為岸信介政府已完全否定日匪「貿易協定」。適於此時，在長崎發生日本愛國青年撕毀懸於「中共郵票及剪紙展覽會」會場屋頂之偽國旗事件，共匪偽外長陳毅，遂於五月十日發表聲明，宣佈廢除日匪間各項貿易協定，全面斷絕對日關係。此後僅透過香港方面，作小額貿易，一九五九年貿易額已減至二千二百餘萬美元，一九六〇年為二千三百餘萬美元；因貿易額縮小，日本政府頗受到國內中小企業指責。至岸內閣末期，因受左翼壓力，逼使政府不得不表示在不談外交承認原則下，與共匪作廣泛之接觸。當時外相藤山愛一郎，曾提出了改善對共匪關係的重要談話，其內容包括下列三點：

（一）對「中共」問題已有重行考慮必要，在必要時，自民黨亦準備派使節團前往大陸。

（二）日本政府將致力於恢復對「中共」之貿易關係，而且不再堅持與「中共」不談政治問題；如果「中共」願聽取日本政治觀點，日本準備與「中共」討論政治問題。

（三）外務省自本（一九五九）年一月起，已成立一個特別機構，專事討論「中共」問題，一俟時機成熟，準備隨時與「中共」舉行大使級會議，以期打開僵局。但如「中共」仍堅持先予外交承認及廢除日美安保條約，則會談將發生困難。

雖然上項談話係在該年參院大選前發表，帶有宣傳成分，不足於代表岸內閣對匪態度，但當時欲以與共匪恢復自一九五八年五月以來斷絕之貿易關

係，爭取選票，確屬事實，惟對匪不作外交承認，仍係對匪政策之基本方針。至一九六〇年春，日本因修改「安保條約」而發生示威及反政府運動，共匪認為有機可乘，遂發表對日貿易三原則，除「政府協定」外，仍可簽訂「民間協定」及與中小企業進行小額貿易。共匪還決定凡日本商社遵守「政治三原則」(①不採取敵視「中共」政策；②不參加「兩個中國」政治陰謀及③不妨礙日匪關係正常化)者，得共匪批准後，共匪稱其為「友好商社」，始得與共匪進行「友好貿易」。自此項「友好貿易」開始以來，至今已成為日匪貿易中的主要部份。

安保騷動結束後，岸信介內閣即提出總辭，池田勇人於一九六〇年七月十九日繼岸信介出任首相，當其組閣之初，在外交上標榜「前進」與「彈性」；並謀積極打開對匪僵局。其所以致此之原因，主要係受國內左翼的壓力，一面由於池田提倡「十年後所得倍增計劃」，必須大量展開對外貿易，對匪貿易亦成了重要目標。在共匪方面因一九五八年與日本斷絕關係，喪失政治滲透機會，未能在一九六〇年安保騷動中插足，此時池田既表示「前進」姿態，自然一拍即合。經自民黨元老松村謙三率團訪匪，並由高碕達之助(前通產相)與廖匪承志於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北平簽訂了一項「五年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又稱「LT貿易」)。自此以後，雙方人事交流亦隨之逐年增加，至一九六三年八月，池田內閣又正式核准由政府銀行貸款，由倉敷紡織公司，以總價二千萬美元之整套尼龍工廠設備用分期付款方式售與共匪，一面又同意日匪雙方互派貿易代表及新聞記者分駐東京與北平；我政府雖一再抗議，未獲結果，遂召回我駐日大使。至翌(一九六四)年一月九日日本將欲投奔自由之共匪油壓機代表團員周鴻慶強迫遣返匪區後，我對池田內閣親匪態度已無法忍受，遂宣佈停止一切官方採購，至此中日關係，已瀕破裂邊緣。池田首相鑑於形勢之嚴重，乃親邀吉田茂前首相代表池田首相，訪問中華民國，與我總統會談，自同年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先後五次會談後，兩位亞洲領袖，獲致了「中日兩國在政治上採取一致反共政策」的結論，使中日兩國關係亦因此恢復了正常。吉田前首相還對我提出保證，決不使用政府銀行資金，担保對匪作分期付款貿易。此即所謂有名的「吉田書簡」。

吉田茂返國後，在國會內對共匪問題，仍風波迭起；池田首相與大平外

相在答詢中，亦常矛盾百出；日本政府為澄清對「中國問題」的基本態度，於同年三月五日透過「讀賣新聞」，發表了一項「中國問題統一見解」的文件；在該文件特別強調「目前日本政府如果與中共發生外交關係，不但表示與中華民國絕交，且將危害亞洲和平與安定，破壞自由陣營團結；因此主張繼續與中華民國維持正常外交關係，與中國大陸在政治經濟分離原則下，維持貿易關係，為符合日本利益之政策」。自此以後，至同年十月池田因病辭職，其內閣一直遵循此一原則，處理對共匪問題。直至今日，此項方針，尚未變更。

### 三 佐藤內閣對匪政策之檢討

佐藤榮作係於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池田因病辭職後在緊急情況下出任日本首相，故在就任初期，為穩定政局，一切肅規曹隨，不作更張，連內閣人選，均一存其舊。佐藤首相在十日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中，除了表示對池田對外政策不作基本改變外，並強調將積極推進「日韓復交」與解決「中共問題」。

對於「日韓復交」工作，在佐藤首相的果斷下，終於在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日草簽了「日韓基本條約」，並於六月二十二日正式簽約，經兩國國會批准後，於同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漢城交換批准書正式恢復邦交。

所謂「解決中共問題」，雖然並未提出任何具體辦法，仍維持在「政經分離」原則下與共匪進行貿易與文化交往，且在處理共匪問題上，一直採取堅定態度。佐藤首相在自民黨內以親美反共著稱，深知共匪政權的存在，是亞洲動亂的禍源，尤其是共匪舉行數次原子試爆之後，其對外侵略企圖，已昭然若揭，且構成對日本直接威脅。因此，佐藤內閣不但對共匪未存有任何幻想，且從佐藤執政以來在對外政策上所表現的積極反共姿態，顯示其對匪政策，仍堅持其「對中國問題統一見解」之方針，一面並配合美國對匪的「圍堵政策」進行，下列若干作為，是我們推斷的依據。

(一)日韓復交的成功，表面上是日本與韓國兩國間問題，但實質上，填補了亞洲反共防線上的重要缺口，對防止共匪對外擴張，有其重大意義與作用，是佐藤政府反共政策的具體表現之一。

(二)韓旋越南和平，也是佐藤內閣的主要外交活動，其目的在避免越戰

擴大，勿使造成美匪直接衝突，使亞洲動亂無法收拾。因此佐藤在韓旋越南和平問題上，採取了積極態度，椎名前外相與三木前通產相於一九六五年七月分訪美、法、俄三國，一九六六年一月椎名外相再訪莫斯科及去年佐藤分訪亞洲十國並親訪越南等，均與調停越戰有關；雖然未獲顯著成果，但配合美國政策，防止共匪對外侵略一點，極為明顯。

(三)一九六六年四月在東京召開「東南亞經濟開發會議」，並於去年舉行「亞洲農業開發會議」，其目的亦在配合美國援助亞洲政策，積極展開經援低度開發國家，提高該等國家人民生活水準，從根本上遏制共匪在該一地區的滲透顛覆。椎名前外相在會中已明白表示此項會議召開之目的，在「透過經濟開發，以求亞洲的安定與和平」。

(四)毅然參加「亞洲太平洋區九國外長會議」；此項會議係由韓國發起，於一九六六年六月在漢城召開，有中、非、泰、越、韓、紐、澳等反共國家外長參加，日本在會議前雖不主張在該次會議強調反共及產生任何形式的反共同盟組織，但會議決定召開後，日本毅然派外長參加，且採取相當合作態度，並積極主張亞洲國家團結與經濟合作，其反共態度，相當鮮明。

(五)佐藤首相不顧國內左翼的反對及共匪的漫罵，單獨訪問中、韓兩國，在東南亞十國訪問中又包括越南在內，更顯示了其反共的積極姿態。尤其在結束訪問亞洲各國之後，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作第三次訪美與詹森總統舉行高層會談，在日美聯合公報中對共匪問題，特別強調了重視「中共」進行發展核武器之事實，並認為如何創造使亞洲各國不受共匪威脅之環境，極為重要。雙方並同意繼續合作，促進亞洲政治安定與經濟繁榮。顯示日美兩國對抗共匪威脅，已獲得一致協議。

此外如一九六五年拒絕劉匪寧一訪日，一九六六年禁止日本青年訪問匪區，在共匪舉行核子試爆後立即公開譴責，在聯合國始終支持我國立場及堅守「吉田書簡」原則等，處處表現了其對匪政策的堅定立場。最近在內閣會議中，在國會答詢中，始終表示日本現行對外政策尚無變更必要，對匪「政經分離」原則，不認為應該有所改變。對使用政府銀行資金担保對匪作分期付款輸出一點，主張依性質個案處理，從未否定過「吉田書簡」精神的存在。

綜觀佐藤首相執政三年零五個月來所推行的反共政策，確較任何一屆內閣積極與堅定。難怪共匪至今猶在繼續漫罵。據本(四)月二十日共匪「人

民日報」所載一篇評論員短評中說：「佐藤政府是戰後日本歷屆政府中最反動、最猖狂反『華』政府……它追隨美帝、勾結蘇修，幹出日本歷屆政府所不敢幹的最露骨的反『華』勾當。」這篇短評，正是佐藤內閣對匪政策的最好反應。

#### 四 中美兩國對日本共匪政策的影響力

日本歷屆內閣對匪政策，雖然已如上述，始終堅持不作外交承認，在政經分離原則下，與匪交往。但十餘年，經常有動搖跡象。尤其是一九六〇年甘迺迪當選美國總統，日本一般輿論，認為國際冷戰必將緩和，共匪加入聯合國已成定局，「兩個中國」，必將出現，判斷美國對匪政策，勢將改變。當時日本社會黨等「革新勢力」極力要求承認共匪，自民黨亦有主張在共匪加入聯合國前搶先承認。池田首相默察國內外情勢，認為對匪政策，有重行檢討必要，除在黨內「外交調查會」實施檢討外，在內閣亦成立「外交問題懇談會」，研擬對策。及至一九六一年六月池田首相應邀訪美與甘迺迪總統會談後，不但使池田了解美國新政府對匪政策堅定，美國並將安定亞洲任務，交由日本負責，並要求日本合作，共同防止共匪之擴張，才使日本打消變更對匪政策構想。至一九六三年法國承認共匪，在日本又引起騷動，紛紛主張步法國後塵；翌(一九六四)年一月日美兩國在東京舉行第三次閣僚會議時，美國國務卿魯斯克與池田首相、大平外相，就對匪政策，作多次會談，當時魯斯克曾明白表示四點：

(一)共匪好戰性格未變，今後亦難望改變。  
(二)法國雖已承認共匪，其他國家不致追隨法國之後採取同樣行動。  
(三)中華民國之國際地位，並不因法國承認共匪而急速下降，美國將全力支持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地位。

(四)共匪加入聯合國尚無可能。  
魯斯克並警告日本領袖，不可在此時期對共匪採取積極姿態，否則將影響自由陣營之團結。池田政府未追隨法國承認共匪，無疑是受了美國態度的影響。

一九六五年一月佐藤首相第一次訪美與詹森總統會談時，曾試探日本成為美匪間橋樑可能性，雙方雖未明白表示，但詹森曾坦率警告佐藤，認為對

共匪任何讓步與妥協，都足以構成鼓勵侵略主義的危險，間接否定了日本的構想。在兩國聯合公報中，美國表示堅強支持中華民國，並認為「中共」對鄰國的「好戰政策」及「膨脹主義」壓力，威脅亞洲和平。佐藤首相自此以後，一直採取堅定反共政策，與詹森第一次會談關係極大。

最近詹森總統發表願與北越和談聲明後，佐藤首相在內外壓力下，曾經過一段相當困惑時期，及至四月七日美國駐日大使強生與佐藤首相作四小時會談，強生大使根據詹森總統訓令，保證美國在未知會日本前，決不改變對匪政策後，始告穩定。

從上述事實演變說明日本對匪政策，受美國影響最大。其所以致此之原因，係由於日美兩國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實有不可分離存在所致。

其次我中華民國對日本共匪政策亦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力量。因為日本深知我中華民國與共匪政權勢不兩立，日本為亞洲自由陣營中重要一員，且與我國簽訂和約，建立正常外交關係。日本如背棄我中華民國，無異背棄整個自由世界。且由於過去中日兩國關係，不但我總統在開羅會議中力排衆議，主張保留日本天皇制度，維持了日本法統；同時我總統又堅決反對俄帝所提戰後由中美蘇三國分佔日本之建議，保存了今日日本國土之完整；戰爭結束之後，我更採取「以德報怨」政策，迅速遣返數十萬日俘日僑；中日兩國簽訂和約時，我又放棄賠償要求，減輕日本精神上、經濟上負擔，有助日本國民恢復其民族自尊心並奠定了經濟復興基礎。此種史無前例的寬大處置，應為日本全體國民所了解。故在道義上，日本決不會輕易改變現行對匪政策。證諸過去事實，每當日本政府對匪政策超越「政經分離」原則時，一經我堅決表示反對，便能獲得合理解決。

## 五 結論

綜合以上檢討日本對匪政策之後，我們已獲得一個初步結論，就是在國際局勢沒有重大變化，美國尚未變更對匪政策之前，日本現行對匪政策，決不會作基本的改變。不過日本參院選舉即將到來，離自民黨總裁改選，亦不過半年，在此半年中，無論在野黨、執政黨，為爭取選舉勝利，擴大本身勢力，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必將利用對匪政策問題，作為政爭工具。從最近日本

國內情勢的發展，下列若干趨向，值得重視。

第一是取銷「吉田書簡」以圖擴大對匪貿易的醞釀。就目前情形，要根本變更日本對匪政策或對共匪作政治承認，尚無可能。但促成廢棄「吉田書簡」原則，實施以政府銀行資金，對匪作分期付款貿易，可能性極大。反對黨乃至執政黨內反佐藤派，提出此項要求，既可討好中小企業，爭取選民，又可從企業家手中，獲得選舉資金的支持；同時，佐藤政府為顧慮我國的堅決反對與自由陣營的團結，又不敢輕易取銷上項承諾，故此一問題，已成了打擊佐藤首相的最好藉口，既可取得選舉勝利，又可以阻佐藤三選連任。預料在七月參院大選及十、十一月間自民黨總裁改選之前，要求取銷「吉田書簡」，要求變更對匪政策乃至與匪建交之呼聲，將日盛一日，佐藤首相在內外強大的壓力下，為了自民黨在參議員選舉中的獲勝及三選連任自民黨總裁俾輝聯首相，極有可能對使用政府銀行資金擔保對匪貿易一點，作若干變相處置。

第二件值得重視的事實，是自民黨內部反佐藤派與非佐藤派議員企圖聯合，勾結美國國內姑息份子、親匪份子，藉美國力量，壓迫佐藤政府變更對匪政策，使日本成為美國與共匪間之橋樑，促進美匪接近，進而阻止佐藤連任。黨內以藤山愛一郎、赤城宗德、古井喜實等為中心的「新政策懇談會」，已公開批評佐藤「政經分離」之對匪政策，主張促成美匪「和解」；另一股以松村謙三、宇都宮德馬、川崎秀二等親匪份子所組成「內外政局研究會」，則主張取銷「吉田書簡」，積極展開對匪貿易。上述兩個組織，並在四月六日召開聯席會議，主張採取聯合行動，除支持擴大對匪貿易及取銷「吉田書簡」外，與美國國會內鴿派份子密切聯繫，更為主要目標。四月十七日起在東京舉行的第一次「日美議員懇談會」中，日本議員（包括自民黨小坂善太郎、大平正芳前外長及民社、公明兩黨若干議員）竟揚言與共匪修好，對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亦主張不再使用「重要問題」案拒絕共匪加入聯合國。出席此次會議之日方議員雖以個人身份參加，但其言行，似均與上述自民黨內部勾結美國鴿派議員活動相配合。事實上，小坂善太郎、赤城宗德等與美國參議員傅爾布萊特、曼斯菲爾德等，早已有了聯繫。

其次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現任運輸大臣中曾根康弘與外務大臣三木武夫的動向，前者在最近一個多月來，不斷在內閣會議要求檢討對匪政策並

主張核准日立造船公司以分期付款方式爲匪造船輸出，在國會中亦公開表示「吉田書簡」已經消滅；十日在拓殖大學開學典禮中更主張與共匪恢復正常關係。三木外相在十九日衆院答詢中，亦公開表示三點：

(一)越南和平實現後，共匪對外政策將會改變。

(二)日匪關係，在可能範圍內力求改善。

(三)日匪復交問題，將由日本自行決定，無須與美國諮商。

以上兩氏之發言，自然各有其政治目的，尤其三木武夫有意開鼎下屆自民黨總裁，其言動更值得注意。以現任內閣閣員，發表與政府政策相違背之言論，充份暴露了執政黨內部弱點，勢將影響選舉結果。如果佐藤派乃至自

民黨在參議員大選中失敗，則未來日本政局必將趨於混亂，屆時日本對匪政策，隨時有變更可能。

到目前爲止，佐藤內閣的對匪政策，尚無作基本上改變的跡象；但基於上述情勢之發展，使佐藤首相已面臨了嚴重考驗。佐藤首相能否渡過這個難關，將視參院大選的結果爲斷。因爲日本對匪政策的推移，與我國關係最大，因此，我們以嚴肅的態度，沈重的心情，來注視日本局勢的發展。我們更要呼籲日本自民黨的領袖們，應以亞洲安全與和平前途爲重，萬不能貪圖私利，而使日本成爲亞洲罪人。

# 蘇俄與中東

王覺源

自去年以阿戰爭以來，蘇俄覬覦中東的野心，已有了進一步的表現。因而也引起了自由世界——特別是北約和中約國家——對負世界責任之美國的疑慮。目前中東的局面，就情勢言，固增加了民主國家很大的威脅；就問題言，祇是俄國二百年來一貫侵略主義的擴張。所謂威脅，祇算是民主國家的主觀感受。在蘇俄則認爲鷄蛋孵化到了一定時機，小鷄必然破殼而出，自然更要耽耽虎視於中東。

我們知道，今日蘇俄侵略世界的作法，原有所謂戰略手段拘束的優勢。儘有一套辯證的政治戰術、經濟戰術、外交戰術以及綜合戰術，可以錯綜運用；但沒有軍事戰術爲之後盾，却仍不可能完成其理想目的。但其軍事戰術的發展，正和其祖先一樣，受了地理環境的限制，一籌難展。

何以說它受了地理環境的限制？因爲蘇俄的地理位置，雖跨有歐亞兩洲，爲世界第一個領土最廣闊的國家；但其缺點：則爲北面的北極海，經年萬里冰封，毫無發展的餘地。東面太平洋白令海峽與鄂霍次克海，亦大部時期冰凍，雖從中國已獲有旅順大連兩港，一以西北利亞的遙懸，一以中、日、

美的阻力，價值亦大爲減少。西面波羅的海，固可供其海軍活動；但大西洋海口，却又操於他國之手。南面由黑海出地中海，固爲一條最理想的路線；但達達尼海峽，又被土耳其所控制。一九二三年洛桑會議與一九三六年蒙特婁會議的協定，蘇俄雖已取得出入達達尼海峽之權；但對蘇俄軍艦出入，至今仍受着土耳其嚴格的規定限制，沒有充分的自由。帝俄時代，在這種地理封鎖情形之下，雖經大彼得、伊凡第四、尼古拉第二的不斷努力，迷信武力侵略，雖造成了一個陸權國家，却終未找出一個理想的出口。所以俄國十月革命時之紅軍統帥托洛斯基曾說：俄國這個國家，東風可以自由出入，西風可以任意吹來，自己却沒有能跨出去的門。革命後的蘇俄，受了托洛斯基的啓示，自然夢寐不忘於此。

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原有許多條件，是不宜於俄國環境的；但其本質，却是要統治整個世界。革命後的蘇俄，既完全接受了俄羅斯傳統的侵略思想，也承取了共產主義統治世界的本質。二者拍合，如虎添翼，也就鑄成了蘇俄的侵略性格。蘇俄侵略世界的軍事戰略，既感於陸權之局促難展，便不得